

军阀列传

辛培林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军 阀 列 传

辛培林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27

责任编辑：马月乔
龚江红
封面设计：安振家

军阀列传

Junfa Lie Zhuan

辛培林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12/16·字数·200,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20

统一书号：11093·229

定价：1.60 元

前 言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军事集团——北洋军阀。它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形成之后，象恶性肿瘤一样迅速膨胀，细胞不断扩散，使一批大大小小的军阀遍布全国，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着政治舞台，阻碍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句：“百年魔怪舞翩跹”、“洒向人间都是怨”，就是当时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群魔乱舞、鬼影幢幢的真实写照和形象概括。

马克思主义在论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时强调，历史要描绘出实际的生活过程，同时还指出：“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因此，描绘北洋军阀乃至大小军阀的个人活动，对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近代和现代的历史，更深刻认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非常有必要的。

众所周知，历史还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军阀个人的成败以及他们之间争斗的起伏等现象，也概莫能外。因此，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利用多种的形式，采取各样的方法去“描绘”它，才能认识“庐山真面目”。可能是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相去并不久远的缘故，至今人们对军阀的轶事、丑闻以及笑话还那么津津乐道。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是历史，但它却脍炙人口，不仅把军阀的丑恶面目“描绘”得活灵活现，而且还将其反动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因此，在记述北洋军阀集团兴亡和军阀个人进退的时候，既要

他们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所从事的重要历史活动为基本线索，又应当充实一些他们之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从而使他们在历史中才“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样，似可收小处着墨而大处见端之效。

本书仅列袁世凯等十人，之所以如此，一是篇幅有限，二是他们足有“资格”充当中国近代军阀的典型了。书中，他们虽是各自为传，单独成篇，但也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总之，通过“列传”，既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阶级的代表，一丘之貉；又可以看出他们出身是三教九流，脸谱各不相同，“才能”有高有低，沉浮有先有后；还可以看出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即通通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而证明：历史的前进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进步代替落后、革命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以上想法不知是否妥当，书中错谬之处也再所难免，祈请读者赐教。

辛 培 林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目 录

1、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1
2、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	45
3、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	87
4、复辟的罪魁——张勋·····	113
5、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	134
6、后来居上的“革命将军”——吴佩孚·····	159
7、煊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	190
8、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	208
9、穷凶极恶的“狗肉将军”——张宗昌·····	238
10、凶狠残暴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	255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民国时代的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也称慰亭、慰廷，别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河南省项城（今新乡市）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所以，有的人还称其为“袁项城”。

在项城，袁氏可谓名门望族。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帮办团练大臣、钦差大臣、漕运总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镇压捻军的刽子手。袁世凯的父亲袁

保中，是地方豪绅，也在乡里办团练。其叔父袁保庆，在袁甲三的军营中当兵，官至江南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在这个官宦人家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八岁以后，随袁保庆到济南、南京读书。1874年，因袁保庆病死，又随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到了北京。1878年，袁保恒也死了，他才回到了家乡。袁世凯一心想通过科举猎取功名，

作为进身之阶。可是，1876年和1879年的两次乡试，他都名落孙山了。这使他非常恼怒，一气之下烧毁了自己作的那些诗文，走上了另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找出路投奔吴长庆

1881年5月，袁世凯到了山东烟台，投奔他的从父袁保庆的结盟兄弟、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的吴长庆。他第一次拜谒吴长庆时，便口出狂言，自称：身为将门之子，愿投麾下效力。吴长庆把他留下后，安排在军中读书。当时，在吴长庆军中参与军事的张謇兼作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的教师，吴长庆也命袁世凯拜张謇为师。张謇给他讲授八股文，久无进步，命题让他去作，结果是文字芜杂，不能成篇，张謇无法删改，他亦叫苦连天。尽管如此，张謇还是在吴长庆面前为他说了不少好话，其他幕僚也添油加醋，为其说情。有一天，吴长庆忽然问袁世凯：“你有什么官阶？”他信口答道：“曾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这样，吴长庆就委他一个营务处帮办的职务。这虽然是一个既无实权，又无所事事的差事，但月薪三十两，还有两名勤务兵侍候，他也就感到很满足了。

1882年，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朝鲜，朝鲜的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卖国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闵妃集团中的兵曹判书闵谦镐聘请日本教官，按照日本的方案改编军队，扣发军饷，遭到了军队中广大士兵的强烈反对。7月23日，驻汉城的数千名士兵捣毁了闵谦镐及其他大臣们的住宅，袭击了日本领事馆，杀死了几名日本官员。次日，起义士兵又冲进了王宫，处死了藏在宫内的闵谦镐等人，闵妃化装成宫女逃走。这就是朝鲜历

史上的“壬午兵变”。兵变之后，同闵妃集团争权夺利一度失势的大院君趁机重新入宫执政。然而，他的统治并不稳固。被赶下台的闵妃不甘心失败，为了夺回政权，她求助于清朝政府。为此，清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调吴长庆、张謇到天津谋划对朝鲜之策。当时，袁世凯听到清政府准备出兵朝鲜的消息后，请求同赴朝鲜，得到了吴长庆的允许。经张謇力荐，委他为前敌营务处。是年八月，吴长庆率三千军队入朝。

清军乘船抵达仁川后，吴长庆、张謇、马建忠等人根据闵妃派人送递的情报，决定当晚派小股部队登陆，由日本人所不知的小道奔袭汉城。当时，清军军纪涣散，士气低落。吴长庆在作战部署时，有的军官以士兵晕船尚未恢复为由，请求第二天拂晓登陆。吴长庆一怒之下，将该军官革职，交军法处看管，并当即命袁世凯为该营营长兼先锋队长，还给予令箭，说如有不服命令者，即行正法。袁世凯毫不畏葸，当即领命，并大声说道：“遵大帅令，两小时内乘小船登陆，如有违误，甘受军法！”他迅速集合了全营，并身着草鞋短裤，向吴长庆告别。吴长庆当众对他大加夸奖。午时，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到达了预定地点，袁世凯滚鞍下马迎接，并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报告。当他说“沿途兵丁有抢夺农家鸡鸭蔬菜等事”时，吴长庆问：“为何不严办？”袁世凯答道：“遵大帅昨日训示，已就地正法了七名”，说着，便提来了七个人头。吴长庆对他十分满意，连连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

“壬午之役”后，清政府奖赏各员，袁世凯自然也被列为“出力有功”的一个。因他说过自己曾捐纳过“中书科中书”，平时在军中又自称秀才，所以，在保奖案内，就以“中书科中书”奏保为同知、赏戴花翎，并得到了朝廷的恩准。谁知就在这时，北洋大臣接到了吏部的咨文，咨文中说：有“中书科中书”这个头衔的人

全都查遍了，没有叫袁世凯的。这样，才发现了“中书科中书”是袁世凯为美化自己而编造的。骗局被揭穿后，袁世凯急忙向吏部的书吏通融、弥合。书吏得到他的好处后，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再追查了。这样，袁世凯也就心安理得地当上了“袁司马”。当时，军中有个名叫周家禄的文案，作了一首七绝诗嘲讽他，诗是这样写的：

本是中州歪秀才，
中书得来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
杀得七个人头来。

不久，袁世凯受命总理各营营务处，兼带吴长庆的“庆”字营，同时办理交涉，会办朝鲜防务，所以，他这时又被人称为“袁会办”了。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要求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开化派。开化派同闵妃集团的守旧派展开了斗争。日本为了在朝鲜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极力支持开化派；而开化派为了夺取政权，也以日本为靠山。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共同策划，依靠日本军队的支持，发动了政变，杀死了一些守旧派官吏，组成了新政府，宣布同清朝断绝关系。这次政变发生前后，袁世凯始终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向李鸿章作了报告。李鸿章授意他在紧急情况下可相机处理。所以，当闵妃集团请求清军援助时，清军立即出动。6日下午，清军到达王宫，与驻守在王宫的日本军队发生冲突。这时，清军统领吴兆有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袁世凯则当机立断，在他的催促下，清军开枪开炮，使日军伤

亡惨重。日本公使见形势不利，率军逃走，政权重新落入了守旧派手中。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袁世凯，是不甘心久居人下的。当他刚刚有了立足之地时，就施展权术，对同级排挤，向上级争权。对一手提拔他的吴长庆也是如此。他非但不把吴长庆放在眼里，而且还视其为上向爬的障碍，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为此，他给他的叔父袁保恒写了一封长信，极力加以辩白。信中说：“此次随营赴朝，只缘报答知遇之恩太切，见营不整，侄为之厘订新章；见操式陈旧，侄为之改练新法；兵之老弱者裁汰之，军官之顽固者革除之。操之过急，不免有越俎之嫌，固属无可讳言。所云欲攘主权以为己有，谣言之来，始自韩人。此次平靖大院君之乱，韩人俱云：‘苟无袁某，吾等早填沟壑。如吴钦差者，乱事告平，犹高坐于大营中。但愿袁某早日袭其职，吾等始克享太平幸福。’军门悉其语，颇启疑窦，只道侄果存夺权之心，有意结好韩民，并征诸订官规、改操法、逾越权限之处，屡见不鲜，益觉可疑可虑，对侄旋形冷淡。而侄居心坦白，仍一味以忠勇事之。伏祈吾叔转函居停，请其速释疑虑，勿信谗言。”信中，尽管袁世凯冠冕堂皇地说什么“报答知遇之心太切”，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干了“越俎”、“逾越权限”的事。哪有这样去报答“知遇之心”的呢？其实，对他“可疑可虑”、“冷淡”的不止吴长庆一个，当时与他一起共事的人也说：“袁世凯不学，其人则诡计多端，在朝鲜时，同行者皆惧与共事。”

向上爬依附李鸿章

1885年，吴长庆奉命率清军回到奉天，袁世凯也另候任用。

这时，他看到吴长庆对自己没有什么用途了，而把持清政府军事、外交、政治大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则是一个新的靠山。于是，他调转了船头，通过巴结北洋文案处的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入手，向李鸿章身边靠拢。1886年8月，清政府决定将李昱应放回朝鲜。李鸿章的幕僚张佩纶见机行事，推荐袁世凯伴送李昱应回国。李鸿章认为袁世凯不但不懂得军事，而且也不熟悉外交，特别是感到他年少多事，尤不放心。但张佩纶“大事斡旋”，李鸿章方表同意派袁世凯再次去朝鲜。可见，水到渠成，他在北洋文案处的功夫没有白下。

袁世凯这次到朝鲜，更是显才露己。据他说：李昱应归国后，“韩王李熙虽与之分属父子，已成切齿之仇，今见生还，犹如芒刺在背，而视余亦如仇敌矣，遂与其心腹金玉均密商图谋害我，幸得闵妃告密。弟遂使用离间计，诱韩相电请爵帅（李鸿章）派弟监理国政，以弭父子争国之祸。”可见，朝鲜君臣挽留他，请他在朝襄助，是因为他使用了离间之计，诱骗韩相的结果。实际上，他这是利用“韩相电请”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李鸿章也受了他的欺骗，不再认为他“少年债事”了。是年9月，李鸿章给清廷的保奏折中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况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昱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似宜优其事权，作为驻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略示豫闻外交之意，并请超擢衔阶，以重体制而资镇慑。”由于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袁世凯“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其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袁世凯驻朝期间，资本主义各国不断扩大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干涉朝鲜内政，唆使朝鲜脱离同中国的藩属关系。这种形势，

使他处境困难。但他面临困境，仍暗中筹划控制朝鲜的政局。李鸿章对此感到满意，1890年初，在办理朝鲜商务请奖奏折中说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并“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于是，1892年8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经李鸿章奏请，仍驻留朝鲜。可见，他投靠李鸿章后，是大得赏识、步步高升的。

1894年，以融合儒、佛、道三教，用“诚、敬、信”教人，号称“东学”，并与西学即天主教相对抗的“东学道”，为反对朝鲜统治阶级残酷的封建压迫，发动并领导了朝鲜农民起义。面对这种新的大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在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记杉村的怂恿下，屡发急电，一再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在他的鼓动之下，清军入朝。日本政府见清政府中了它的圈套，便以中国违背1885年中日两国订立的“两国如欲派兵至朝鲜须互相知照”的协定为借口，派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日军入侵朝鲜，并迅速占领了汉城。中日军队对峙，战争即将爆发。袁世凯一见局势严重，又知日本对他怀恨已久，为了躲避风险，于7月19日请调回国。其实，他在“奉旨调回”之前，就改装易服逃回天津了。

这时，袁世凯预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将要战败，李鸿章也会因中国的战败而失脚，李鸿章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他到天津后，先到李鸿章处述职，尔后进京。但，深谋老算的李鸿章担心他进京会对己不利而没有同意。8月1日，中日战争伊始，即将他派到凤凰城办理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可是，袁世凯到任后，并没有去掉进京的念头。他不管军务如何繁忙、战事如何紧张，仍一意孤行，秘密进京去了。不出李鸿章所料，他到了北京就暗中拆李鸿章的台。他把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

两次从朝鲜调回吴长庆的军队如何失策、与伊藤博文在天津所订的条约如何错误、以及中国军队调回后他在朝鲜的对日交涉和处理朝鲜问题如何困难等均罗列成文，并将有关的来往文电抄录于后，汇编成十余册，呈送给了北京要人们。他还觉得不够劲，又把在奉天等地所见所闻李鸿章的淮军纪律败坏、军官昏愤无能等情向督办军务处的王大臣密陈，并建议：“战事拖延，决无希望，不如早和，否则京津亦恐难保”。他的这个秘密报告，转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后，对平息帝党和后党的战和之争以及他们做出同日本议和的决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因战败而割地赔款，损失巨大，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耻辱。当时，朝野上下认为，这皆由袁世凯一人任性妄为闯下的大祸，所以，正象他自己所觉察到的那样，除二、三人外，其余的人都用白眼看他。当然，全部罪责归于他一个人的任性妄为，未免太过。但也不能不说他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然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庇护下，他非但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反而却抬高了身价。有一次，恭亲王问李鸿章：“听说这次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可信吗？”李鸿章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也。”除李鸿章外，日本也大帮其忙。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期间，伊藤博文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为“中国有数人物”。李鸿章也当面把这些话告诉了袁世凯，还表示要“专折奏保朝廷，破格录用”。不仅如此，中外报纸还将李鸿章和伊藤的谈话内容公之于众，这样，袁世凯的身价顿增十倍。他自己说：这时，“一般先生大人见之，咸以青眼相加”。由“白眼”到“青眼”，世态炎凉，自不待言，重要的是，他竟逃避了应得的惩罚！

换门庭巴结荣禄

袁世凯虽然依靠李鸿章，捞到了大量的好处，但他绝不是死抱着这棵大树不放，而是利用他在朝鲜赚来的“名气”为资本，与北京的各种政治势力、各方面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到处钻营。他经徐世昌介绍，投拜于“北清流派”首领李鸿藻的门下，并同这派的中坚人物张佩纶过从甚密。对“南清流派”首领翁同和，他也通过在朝鲜时结识的吴大澂挂上了钩。所以，他能够得到当时在朝廷中颇有声望又掌握舆论的“清流派”的赞许。他不仅同“清”的交往，而且还更注重拉拢那股“浑”的，即浑浑噩噩、昏愤无能而又握有实权的满族亲贵。他们虽然名声不好，但有实力。为了寻求进身之阶，哪里还管什么名声好坏呢。于是，他托人介绍，投到李莲英门下，再“得其承介”，才获得了巴结慈禧太后的宠臣、握有军权的步军统领荣禄的机会。荣禄其人见识一般，喜欢别人恭维、奉承，还是个财迷，特别爱金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不管什么人品好坏、是否贤良，一概网罗。因此，袁世凯随着李鸿章地位的日衰，就在荣禄身上下了功夫，这既可借以自固，又能达到继续向上爬的目的。

中日战争的失败，原因十分明显，就是清政府的腐败。然而，当时一些人不敢直接对朝廷说三道四，只好舍本求末，大谈军队如何腐败。清军随着内忧外患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也经历了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的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没有改变它依然是使用旧式武器、用旧式方法训练的“旧军”。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屡战屡败的事实，使人们更加明显地看出，“旧军”已不可救药了，必须训练“新军”。于是，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

之策。这时，有温处道头衔而又无事可做的袁世凯，看到这股风是他再次进行政治投机的良机，便急忙召集幕友，租赁了“嵩山草堂”，在这里吃、住，日夜不停地翻译、撰写了兵书十二卷，还提出了一个编练新军的设想，抢先送给了正在筹办编练新军并物色人材的荣禄。他在荣禄面前，借机大吹大擂，讲了一通外国的兵制，搞得荣禄云山雾罩，博得了荣禄赏识，夸奖他“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这样，他又时来运转了。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淮系官僚胡燏芬将东征粮台卫队改练成“定武军”，共十营，驻天津小站。不久，胡燏芬被派去修造京芦铁路，“定武军”无人统辖。这时，荣禄就推荐了袁世凯。1895年12月，他被派往小站，接管了这支军队。这支军队也就成了袁世凯编练新军、创立北洋军阀武装力量的奠基石。这样，袁世凯巴结荣禄又如愿以偿了。此后，他更加紧勾结荣禄，而荣禄对他也处处加以袒护。当有人参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节制”时，奉命前往查办的荣禄就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为由，“乞恩姑从宽议”而了之。因此，他对荣禄更加感激不尽，并乐为其所用。

练新军创建北洋武装

袁世凯接管了“定武军”之后，立即提出了“督练新建陆军上督办处辨禀”，督办处王大臣马上奏报了朝廷，并说：“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饷章，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飭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当天就得

到了批准，上谕中说：“该道当思筹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懍之！慎之！”袁世凯接旨后雷厉风行，立即派副将吴长纯、都司魏德清等人分赴淮、徐、鲁、豫、奉各地选募丁壮，购买马匹，将“定武军”很快扩编为“新建陆军”。它同清政府的其他旧军迥然不同，是仿照德国军队的编制、聘请德国教官、采用近代军事训练方式训练、由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军队。

袁世凯一开始就要把这支军队牢固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他的政治工具。为此，他精心网罗了一批政客、武夫，并用种种封建纽带把他们结固在自己的周围，形成死党，然后安插在“新建陆军”中，委以重任，充当其爪牙。武的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陈光远、雷震春、陆建章、段芝贵等，文的有徐世昌、唐绍仪、梁士诒、杨士琦等。他为了培植党羽，在“新建陆军”中，仿照西方，创办了炮队、步队、马队等武备学堂，进行军事教育。后来，他得意地说：“其毕业诸生才艺有成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其志期远到者，选五十余名派赴日本游学，以资深造。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校官弁，亦多取材于此。”这样，一股新的北洋势力孕育而成了。它虽然规模不大，仅有七千人，但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后来几乎遍布全国。民国期间，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师长、旅长等，大都是从这个巢穴中孵化出来的。他们群魔乱舞，操纵政局，残害百姓达十几年之久。

1897年，清政府认为袁世凯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次年，“新建陆军”与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划归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统一节制，通称为“北洋三军”。“北洋军阀”一词中的“北洋”二字，就是